

汉武帝治理黄河

□ 丁 涛

在历史长河中，中华文明的孕育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，从“大禹治水”到“勘定九州”，虽有传说的成分，但大多反映出以农耕为根基的文明发展演进的主体形态；据《史记·河渠书》所载，夏、商、周三代对黄河的治理，除较小规模灌溉农田，主要目的还是在于防水患以保护脆弱的农业生产；至春秋战国，在重视耕战的大背景下，伴随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的革新，农田面积得到大幅提高，以秦、齐、魏等国为治水成功代表，对兴修水利在富国强兵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，但因各自为政，尚未形成总体治理的效果；进入秦汉大一统时期后，兴修水利则成为历代帝王的“必修课”，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对黄河的治理和利用，发挥着支撑“外事四夷，内兴功利”国家战略的关键作用，凸显了尽地利以务农本、固边防以拓疆域、通河渠以合海内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。

着眼除害兴利

汉武帝时期治理黄河水患，经历了一个由放任自流到主动作为的过程。

建元三年（前138年），史载“河水溢于平原”，发生大饥荒、“人相食”的人间惨剧，从史料上看，当时朝廷并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。第二次是在元光三年（前132年），先是春季河水从顿丘改道流向东南，当年东郡濮阳县瓠子堤发生决口，河水注入山阳郡巨野县，与淮、泗二水贯通，泛滥周边十六郡，规模之大、危害之巨前所未有，汉武帝派遣汲黯、郑当时发卒十万前去堵塞未成，进而在武安侯田蚡的劝说下，鬼使神差地采取了放任不管以应“天事”的姿

态，自此20余年，梁、楚之地，数岁不登，受害尤其严重。

直至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，汉武帝封禅途经洪泛区，亲眼见到灾区民生凋敝的悲惨景象，才意识到是受了之前田蚡等人的蒙蔽，遂下决心治理水患，看准了濮阳地区干旱少雨、正值枯水期的有利时机，于次年四月先遣汲仁、郭昌发卒数万堵塞决口，此后专程亲临视察，沉白马、玉璧于河中祭祀河神，“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负决河”，随后又开凿渠水，引其北流、灌溉农田，最终获得成功，汉武帝还特意赋歌两首、营建宣房宫予以纪念，自此“用事者争言水利”，掀起了主动治理水患、兴修水利的高潮，开拓出数以千万计的良田，进一步改善了作为根本的农业生产条件。

据史载，与汉武帝直接相关的灌溉工程达到9项之多，规模空前。此外，在治河过程中，还逐步形成了成套做法，如齐人延年上书武帝时即已提到“可案图书，观地形，令水工准高下”成熟的勘测技术；同时，还于穿洛水以灌溉“恶地”时，开发出井渠技术传至西域，成为沿用至今的“坎儿井”。

重视运用黄河中上游水利

汉武帝一朝对黄河水的治理利用，除却保障基本的民生和农业生产外，还伴随着对北疆匈奴安全战略的整体推进而逐步深入，特别是通过开发水利，有力支撑了边疆地区屯田政策的落地，大幅节省了漕运费用，极大改善了军民生产生活条件。

元朔二年（前127年），卫青、李息等率部采取大迂回方式，奇袭并击溃白羊、楼烦二王，夺得战略要地河南后，在主父偃建言

下，利用“河南地肥沃，外阻河”地理优势，下令营建朔方、五原二郡予以巩固，徙民十万充实之，成为立足北部边疆核心地域的中坚力量，而事实上朔方、五原一线“地固沮泽、咸卤，不生五谷”是其主要特征，如不予以改造是很难立足的。

因此，在后续的发展中汉武帝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，自成功治理瓠子决口并开凿渠水后，又将之推广至朔方、西河等地，随着对匈奴作战的顺利推进和疆域的不断扩大，利用黄河水系改造良田已深入河西、酒泉一线，为开发河西走廊、凿空西域提供了重要支撑。如朔方郡所在地，即今天著名的灌溉平原，便始自汉武帝“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”，也因此留下了“天下黄河，唯富河套”的民谚。再如河西走廊灌溉区，开凿于武帝元狩至太初年间，其水利涉及的弱水、疏勒河一线，灌溉农田约占20万亩，以至“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渠，置田官”，出现了屯田规模化的趋势，为巩固边防、确保安全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之后，又将水利向西域推广，太初三年（前102年）攻破大宛，汉廷威震西域，于是“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，而轮台、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”，规模不大，但因水利带来的利好，极大地支撑了对西域的经略。

构建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言：“汉兴，海内为一，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，是以富商大贾，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，莫不通得其所欲”，大致描绘出当时商业之发展发达，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，连接关东诸郡、南

控巴蜀之地、笼络西北陇右一线，在此核心区域营造发达的水陆交通，自然成为强干弱枝总体布局的关键。但从各区域交通实际上看，“关以东由河入渭，河则有砥柱之险，渭亦颇迂曲狭浅；南抵巴蜀则山道险远；而关中因人口密集之故，所需粮食，常仰给于关东”。

汉武帝着眼江山一统，伴随尽徙天下高货豪族于关中的举措，进一步深入拓展了水陆交通网络，特别是结合治理黄河水患，兴修了若干重要漕运工程，不仅对黄河水利的开发做了有益尝试，更是为后世深入发掘提供了重要借鉴。

典型的漕运工程有两项。一是为确保关中核心区域物资供应，解决漕运迂远、耗费过大的问题。元光六年（前129年），时任大司农的郑当时建言：“穿渭为渠，下至河，漕关东粟转易，又可以溉渠下民田万余顷。”于是决计开凿漕渠以沟通华阴至长安一线，遂发卒数万，用了3年时间，完成了此项工程，不仅大大节省了漕运所费，沿 line 农田也得到了很好的灌溉。不止于此，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为征伐西南夷而修建用于练兵备战的昆明池时，也得益于此渠的开凿。

另一项工程是对褒斜道的水陆开发，此项工程设计初衷在于“穿褒斜道，少阪，近四百里；而褒水通沔，斜水通沔，皆可行船漕”，实现连接关中与巴蜀之地要道的水陆并进，经过修整，虽因水湍石大而不可漕，但在后世却成为了连接川陕的交通要道。



路、提供标准、提供政策、提供环境。地市层面主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结合本市实际出台实施细则，确保试点项目早开工、早建成、早投用。县（市、区）层面主要是不折不扣抓好落实，保障试点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。

二是加快健全“宽进严定、优胜劣汰”的创建机制。按照“重实效、轻牌子，上不封顶、下不保底，宽进严定、动态评价”的原则，只要居民有意愿、地方有需求、创建有规划的社区，均可申报创建。强化扶持政策的“期权激励”，3年一个建设周期，到期验收合格的，予以兑现奖励性的支持政策；到期没有达到建设标准、没有实现承诺进度的，予以警告、降格和淘汰，还要予以一定的惩罚措施。

三是加快健全“居民来做主、第三方评价”的考核机制。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，以居民满意度作为最终评价指标，完善第三方考核评价制度，推动各地形成“比学赶超”的良好氛围。

要坚持问题导向，鼓励改革创新，最大程度激发基层群众蕴藏的改革动力和治理智慧，及时总结、提炼和推广基层破解体制性障碍、机制性梗阻的成功实践，以及创造出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、治理方式、治理手段，并将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推动上升为制度、转化为法律，进一步推动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。当然，基层探索需要主动，但不可“盲动”，更不可“乱动”。始终讲规矩、守章法，遵循党中央统一部署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度规定，做到毫不动摇坚持、与时俱进发展，促进如期形成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清高宗年间所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承前启后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。有关《四库全书》的研究，20世纪80年代，就已有“四库学”概念的提出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“四库学”的内涵外延不断得以明确，并有所增益。最近，还有学者提出对《四库全书》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倡议。这一倡议推动了“四库学”的发展，也引发了对“四库学”新的讨论。

唐开元时，皇家藏书以甲乙丙丁为序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各为一库，置知书官八人分掌。凡四部库书，长安、洛阳两京各一本，共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。四库由此得名。从四库得名可见，四库，有两层含义，一是经史子集四部文献，一是以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为序的学术体系。至近代词义发生了转移，演为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之名。

《四库全书》研究历程

《四库全书》，是乾隆年间纂修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，自成书至今，已走过了200余年的历史。时至今日，七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仅存其四，保护弘扬之任刻不容缓。

回望《四库全书》研究历程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，即20世纪以前的准备阶段、民国年间的初兴阶段、1949年至1979年的不平衡发展阶段、改革开放后的多元繁荣时期。

20世纪以前，学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四库补续纠谬或条纲系目上，完整系统之作不多，研究成果少。这个准备时期，开四库补撰先河的是阮元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。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体式，收录四库未收书170余种，进呈嘉庆后，得嘉庆“宛委别藏”之隆恩，遂开四库补撰之先河。不过，创始之作难为工，《四库未收书提要》存在诸如没有分类、不便检寻、书成众手、时有抵牾等不足。这些不足由傅以礼《研经室经进书录》、李湛然《四库未收书目表》、胡玉缙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》等加以完善。

当然，虽然这只是个准备期，但四库修书时，就有传教士把它纂修的事传回欧洲，并寄回这些版本。其成书之日，更以东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取得了世界性地位。而其共生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成书不久，即传入了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。

日本方面，宽政五年（1793年）癸丑商舶载入《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一部二套、宽政六年（1794年）赁入《四库全书目录》一部二套、天保十五年（1844年）传入《四库全书提要纲目》，嘉永二酉岁（1849年）传入《四库全书考证》一部八套。朝鲜方面，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的10年期间，朝鲜使臣始终关注全书的编修过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在乾隆末年编成印行不久后，便由朝鲜使臣携回朝鲜。在东亚各国都关注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的背景下，越南也在19世纪初引入了该书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的传入推动了日、朝、越等国目录学的发展，促进了他们汉学研究的进步。不过，国外对《四库全书》及其相关著述的研究，研究视野不广，研究水平和层次都有待提高，更谈不上从专学的角度进行考察。

民国时期，《四库全书》研究解脱钦定束缚，进入初兴阶段。先是陈垣对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进行清点，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。稍后，余嘉锡、胡玉缙、杨家骆、任松如、郭伯恭等，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。

同时，因其于清代盛世修撰，传承了中华文化，使之成为有清一代文化象征。当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后，《四库全书》再次被加以关注，寄予了期许，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，即以国家文物身份代表着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。其地位也有增无减，视之为“我国历代文化之所寄，一国国粹之结晶品”者，大有人在。

其间，就如何对待《四库全书》及其影响等，展开了广泛讨论。如张元济等出于“发扬固有文化，保存国粹”的目的，倡导影印。王国维因听闻傅仪卖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，遂建议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连同内务府古器物、书画一同开放，供大众阅览。1925年，吕思勉为“广国民之意”，建议国民自设艺文馆，以《四库全书》为基础出版“民国全书”。徐世昌、章士钊、张学良等官方代表则冀望广其流传，达到保存文物、宣扬国威、传承中华文化、沟通中外文明的目的，也积极倡导影印《四库全书》。还有呼吁文澜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应赶快

从《四库全书》到

□ 陈晓华

流通，教育部作为一国文化最高机构，不应有歧视之态，以免文物受损。在内外诸因素推动下，从1920年至1935年，共掀起5次影印浪潮，虽然影印之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，但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》得以编印出版，并被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。这些无疑都推动了《四库全书》及相关研究的深入。

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，《四库全书》研究进入不平衡发展阶段，步履艰难，进展缓慢，趋于停滞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“四库学”“四库总目学”“四库区域文化学”等概念相继被提出，并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。这个时期，最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四库学”概念得以提出并得到学界正式认可。1987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为蓝本缩印出版。深藏秘府的《四库全书》终于真正实现了公藏理念，进入大众视野，激发了海内外研究《四库全书》的热潮。与四库学相关的书目、文献档案也接连面世。这一切同《四库全书》一道，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除新视野新思维新观念外，影印再掀高潮。与此同时，专门的《四库全书》研究机构相继成立，成为当今传统文化热中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四库学关乎中国古典文化传承

虽然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“四库学”概念，并且与《四库全书》紧密相连，但追而溯之，其源头是很早的。至远，可溯于隋代，即以经史子集为名为序的四分法确立时期。至近，则为清高宗下诏定《四库全书》之名之时。清高宗认为，四库之目囊括“古今数千年”“宇宙数万里”之间的所有典籍。他把自己钦定的书籍以四库全书名来命名，就是希冀凭借四库典籍及其体系，即经史子集四部所涵括的分类及其知识体系，全面统筹整合古今中外典籍。既使学术文化源远流长，又确保“治统”“道统”合一，实现“大治”。由此可见，清高宗时期，四库著述已成大观，足以独立成学。

虽然因《四库全书》研究而有“四库学”概念，但就清高宗对其命名宗旨、对它的研究现状而言，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《四库全书》本身。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“四库学”既专精于以《四库全书》为本之研究，又超越了它本身，研究范围可达至经史子集所有文献，广涉中国各种古典学问、技艺，并兼及外来学术。

故而，我们的“四库学”，不只关乎《四库全书》一身，而且关乎中国优秀文化及其传承弘扬。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。